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2年·哈尔滨

1.0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0.5

责任编辑：孙玉海

封面设计：蒋明

封面题字：周慧珺

黑龙江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黑龙江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铅印室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12/16 字数168,000

1982年10月第1版 198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1093·108 定价：0.87元

目 录

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掠夺东北大豆和吞并
民族工商业的

.....郭守昌 (1)

回忆同记商场

.....刘实秋 (13)

成记针厂发展史

.....任廷玺 (123)

乌拉嘎金矿史片断

.....顾 赠 蔡兰芳 (142)

清代墨尔根——额穆尔河、漠河驿道调查记

.....姜·涛 (182)

附：站人小考

.....姜 涛 (205)

清初吉林乌拉——瑗琿驿站的设置

.....吴文銜 张泰湘 (216)

哈尔滨市五十年金融概况

.....孙也工 (226)

花园酒香

.....马亚川 (241)

日本帝国主义是怎样掠夺东北大豆和吞并民族工商业的

郭 守 昌

我是一九四〇年（伪康德七年）春由铁路辞职到齐齐哈尔市德增盛火磨油坊制米厂的。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统治越来越紧，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制定各种经济统制法，把中国民族工商业强行纳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利润轨道。它软硬兼施，时而利诱欺骗，时而恫吓讹诈，甚至血腥镇压，以达到其彻底统治的目的。

在制粉方面，伪满成立了谷粉统制株式会社，面粉由专卖署专卖。德增盛火磨规模很小，只有三台小磨，日出粉五百五十袋，在一九四〇年即被专卖署取消了，所以本文不加叙述。以下仅就大豆方面作一概述。

东北大豆质高价廉，世界闻名，可为食品、油脂等工业提供原料，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垂涎三尺。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逐步建立起统治。“九一八”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对中国人民进行剥削压榨，大豆自然成了想方设法扩大掠夺的对象。

“满洲国”的傀儡招牌挂出以后，日本人总揽大权。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他对铁路倍加重视，强令伪满洲国政府将东北铁路大权交给“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南铁”在沈阳设立铁路总局，管理伪满的全部铁路。伪满虽有交通部，但却管不着铁路。日本

帝国主义控制了铁路大权，就为其扩大掠夺经济资源创造了条件。日本人采取铁路与银行相勾结的办法，实行“大豆(豆饼)混合保管”，加速和增强对大豆的掠夺。估计每年被掠夺走的大豆达一、二百万吨。

所谓“大豆(豆饼)混合保管”，就是民族工商业者把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大豆，按每袋八十四公斤(外加二公两增量)的量装入麻袋，缝好袋口(缝法是双线不少于十八针)，得到车站允许(为多得大豆一般都允许)，运进货物站台保管，不收保管费。当时三十吨车皮较多，每车三百五十二袋，便是二万九千五百六十八公斤。货主提出“混合保管申请书”，由“铁路混合保管检查所”派检验员进行检验，按质量不同定为四等。麻袋的新旧也都有注明。检验员每人都有一个刻有各自代号的胶戳，检验后将代号打在每个麻袋上。质量等级完全由检验员说了算。检验后由车站开“货物引换证”。凭此证，可以提取同等货物(当时只限于发往大连的大豆或豆饼实行“引换证”手续)。货主凭此证到伪满兴业银行作为抵押借取贷款，数目为时价的80%。货主有了贷款便可继续从农民手中收购大豆。豆饼是每车皮一千一百片，核三万零八百公斤。质量检验只分合格不合格，无等级之分，主要是以重量而定。检验后，同样开出“货物引换证”。

“货物引换证”的作用，一是加速货主的资金周转。货主不必等大豆运到大连、卖出后将款汇回再继续买大豆，而是凭“引换证”直接向银行贷款，大大缩短了资金周转时间。这一作用十分重要。因为民族工商业者绝大多数资金较少，如若中间停顿，资金便周转不开，势必减少大豆的购买量。二是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冬季是大豆的发运旺季。大连方面如果必须等货到后才能进

行交易，那末铁路势必在货主托运后就立即装车发运，运输压力就很大；如若不及时发运，又会造成大连大豆交易的停顿。当时，在大连大豆或豆饼的买卖多为投机倒把性质的，只要有可靠的凭证即可成交。因此，当时在大连实际上是“引换证”的买卖。大连的油坊都是买东北货主的“货物引换证”，凭此证即可到车站兑换大豆。另外，“引换证”兑换的大豆，只需等级、麻袋属同等标准即可，无需原货，这样，自然就缓和了铁路运输的紧张。

豆饼本是油坊生产的副产品，但是在旧中国，由于豆饼能当榨油原料出口，豆饼往往成为主产品来生产。当时，齐齐哈尔市有油坊十二家，都是螺旋式油榨，其字号是德增盛，有五十九台油榨；义增永，有二十三台油榨；其余的三合永、兴信油坊、田糖坊、田糖坊升记、田糖坊玉记、复成永、昌记油坊，义信昌、涌巨广等，油榨都在十台上下。榨油行业成立油坊组合。豆油不仅经销本市，而且销往外地。豆饼除一部分作为饲料在本地销售外，大部分验“混保”发往大连。豆油加工技术十分落后，将大豆筛完后放在热炕上，用人工翻腾，豆子暖好后，用豆碾压成豆坯，每块豆饼约下豆坯三十二公斤，将豆坯摊在油包布上用汽蒸，约到一百度时，放在两根饼圈内，用油包草包好；用脚踩成豆饼，每五块为一垛（每块豆饼内需加上本厂字号的铁印）；将豆饼放入油榨，人力拧螺旋加压，便出豆油了。把油挤完后，起出豆饼，按“满铁”规定，每块豆饼重二十八公斤，按季节不同每块加量二至四公两。豆饼边可刮下来混入豆坯内重新加工。由于榨油技术落后，加工后的豆饼中尚有6—8%的残油。拥有先进技术的日本和西欧将豆饼当作油料进口，重新粉碎浸出，仍可出

5—7%的豆油。日帝紧紧抓住这一资源，一方面自用，一方面向西欧出口，获利很多，因此对豆饼是**有多少要多少**。中国经营油坊的工商业者；也因生产豆饼有利可图，加上当时人民的购买力极低，豆油消费量很小，油坊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豆油销售量，因此，油坊都把生产重点放在豆饼上，“**要饼不要油**”，在加工中即使少出油也是情愿的。

油坊的劳动是十分艰苦的，资本家为了提高加工能力，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按正常规定，每班七至八人（压豆、浆豆除外），每人每天加工五个垛，这叫“官垛”。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在“官垛”外每人再加五个垛，外加的垛，在工资外加钱，叫“垛利”。这样，工人的劳动强度就相当大，而且劳动条件恶劣，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当时，每月能出工二十五、六天的人就算不错了。资本家为了不误生产，又补充“替班”的人，谁歇工，这份工资（加“垛利”）就由“替班”的人挣去了。

“豆饼混合保管”曾经一度使伪满的油坊行业十分兴旺，生产能力急剧膨胀起来。但是，好景不长。一九四〇年冬，伪满当局为进一步加强粮谷统制，公布了粮谷统制法，并成立了粮谷统制株式会社。勒令中国的粮栈成立粮栈组合，每家粮栈营业要重新申报批准，发给营业执照，擅自买卖粮食者，以违犯统制法论处，轻者罚款，重则处以徒刑。各粮栈每日向粮栈组合报表，无伪政府许可不得动用一粒粮食。当时伪齐市公署有一个经济科，专管此事。油坊加工用豆，由粮栈统一供给，豆油、豆饼统一配给市民，从此以后，“混合保管”结束了，油坊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竭力支持德国法西斯，大部分大豆都运往德国，供中国人经营的油坊加工的数量很少。

油坊因原料不足无法正常生产，开始赔钱了。

到一九四一年春天，伪满当局再一次加强粮谷统制，又成立了“专管公社”（专为统制大豆的机构），具体业务由“三菱公司”（日本垄断资本集团）负责，不仅控制了油坊原料和产品的供销渠道，而且完全控制了豆油和豆饼的价格。大豆按统一价格卖给油坊，豆油和豆饼必须按统一价格卖给“专管公社”。当时由于物价上涨，榨油所需油包草、油包布、煤、电等都在涨价，各家油坊都是入不敷出，叫苦连天。谁要不干，就说你不支持“大东亚圣战”，当然也就是“反满抗日”了；加上每家都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油坊生产机构，又是人，又是机器设备，不干这个又能干啥呢？再闹一个无业游民就更麻烦了，只好挺着干。

一九四一年夏天，伪满政府又将“谷粉统制株式会社”（管面粉）、粮谷统制株式会社（管大粮）和“专管公社”（管大豆的）合并为“农产公社”，代表伪满政府将粮食无所不包地通通统制起来，具体业务委托给“三菱”来办，油坊生产完全陷入了绝境，不仅要受“农产公社”的严格控制，每天的生产情况要向“农产公社”报表，定期检查，生产的油若与规定数额不符，就是违法；还要受到特务、警察的欺压，居民配给豆油极少，两、三个月才给半斤油，那些特务、警察和有权势的人，随意到油坊打油，不给不行。当时，油坊因答对不周而挨打的不在少数。不给他们油要受气；给了油，到时不能按报表付油，就说你违犯了统制法，又要受罚。油坊真好象豆饼一样，两头受压。由于检查油帐一般要在“清囤”时进行，因此，油坊总是忍痛先应付这些特务警察，这也算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

有一天，我们油坊来了一个穿灰风衣的二十多岁的人，到屋

里打了个转，没吭声就走了。我看这个人有来头，但又不认识，不便上前答话。过了一会儿，我要上街办事，走到门洞子时，见那人正在检查每个打完油的通账上的领油数和实际油数是否相符。我一看这是“找茬”来了，就赶紧上前陪笑打招呼，把他请到屋里点烟泡茶，杨副经理也上前陪礼，说：“刚才因为不认识，太慢待了。兄弟要用油，尽管开口，不必客气。”这么一虚呼，他才放软了说：“那好吧，明天拿桶来。”第二天果然来了一个人，拿了张便条，就把油打走了。后来听说此人姓王，是永安里某“大茶壶”的儿子，在日本宪兵队挂了个衔。我们知道这种人惹不起，赶忙托人打招呼、赔不是、套近乎。杨副经理颇有感慨地说：“这年头买卖人倒了血霉，什么王八兔子的气都得受。以后大家多留点神。”

如果说，特务警察是狼牙，喂几块肉还能对付得过去；那末日本帝国主义则是虎口，一旦落入，九死一生。如前所述，各油坊是向“三菱”买大豆，因为接连赔钱，用现钱买就买不起了，只好向“三菱”赊购。先是交一半钱，后来越赔越多，一半也交不上了。十二家油坊统统成了“三菱”的债务人。正当各油坊走投无路时，齐市商工公会驻会理事武田（日本人）通过会长王玉堂（汉奸）放出风来，说油坊赔钱是因为规模小、设备差，而且产量太低，不符合“大东亚圣战”要求，要把油坊合并组成大油坊。这个风声越来越紧，不久，王玉堂出面召集各油坊开会，武田到会坐阵，研究成立大油坊的事。他们提出，要找一个地点，盖上大厂房，修上专用线，各油坊的人员设备都合并到一起。由“三菱”投资并发行股票，成立制油株式会社。各油坊心里都明白，这叫趁火打劫、“大鱼吃小鱼”呀！机器设备往大油坊一搬，给一把

股票，就完了，说啥也不算了。说是股东，想从日本人那里分利润，那是白日做梦。但是，在会上谁也不敢公开拒绝，只是支支吾吾打圆场语。

很快，“三菱”从大连调来一个叫吉田的日本人，是个搞油坊的内行，很快画出了一个草图，这时，伪省公署的小林、“三菱”公司齐市支店长佐藤、“农产公社”支店长外山和科长足立等也相继出面，不是要债，就是游说。日本人和汉奸串通一气，通过各种渠道，运用各种办法向油坊施加压力。各油坊是有苦难言，这是步步紧逼呀！先是对大豆统制，然后叫你赔钱、欠债，使你走投无路，逼着你就范。

一九四二年，“三菱”逼债步步加紧。一次，伪省公署的小林在会上说：你们各油坊不参加大油坊也可以，只是你们的油坊规模小，成本高，不符合“大东亚圣战”要求。你们可以报黄，把设备当废铁卖给省公署，我们正急用废铁制造农具增产粮食。大家一听全傻眼了，成套的机器设备当废铁处理，整个油坊不就完蛋了吗？

在日本人的直接操纵下，大油坊终于搭起了架子，称为“龙兴制油株式会社”，汉奸王玉堂为社长，日本人吉田为取缔役（经理）。“三菱”开始认股，并要各油坊将能用的机器向“龙兴制油株式会社”呈报清单，以资核价。这一来，问题到了实质，再支吾敷衍不行了。作价时，矛盾很大，“三菱”定的价很低，每台螺旋榨只核五百元，按这个价，各油坊的机器都抵不上欠“三菱”的债。几次会议，都争执不下。“三菱”的佐藤逼债又甚紧，各家油坊无奈，有的要拿房子抵，有的要拿土地押。而这时，佐藤又扬言，要么现钱，要么“龙兴制油株式会社”的股票，其他一律

无效。“三菱”的逼债阴谋也就昭然若揭了。

因核价问题陷于僵局，伪省公署向市警务处授意，向各油坊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一九四二年四月的一天晚上（当时我未
在柜上），齐市警务处经济保安科出动二十多人，坐两辆卡车，进行所谓“对各油坊违犯粮谷统制法大检举”，将十二家油坊的掌柜都抓了去，德增盛因经理王向良年迈多病，卧床不起，将副经理杨景溥抓去了。油坊驻上了伪警察。第二天上午八点多钟，经济保安科又来了七、八个人，勒令油坊停止开工，彻底清查，足足查了一天。伪警中有个叫夏重武的（外号夏大个子）死心塌地效忠日寇，更是无处不查，耗子窟窿也要掏三把（此人在一九五一年镇反时被镇压）。当时做买卖的，每日如坐针毡，还哪敢违法，查了一天，没查出大漏子。但查出一笔德增盛向兴业银行用高粱碎米作抵押的贷款（当时德增盛并无粮食，这些碎米是作为加工费收入的），抵押数与贷款数不符。其实，这类事在正常情况下是常有的，贷款主要是靠信用，抵押数稍有差别并无关系。但是这回不行了，兴业银行也乘人之危，出动人马，大肆查圈，不够数的将麻袋之类的东西都收罗去了。这样闹腾了一个星期。不久，商工公会的武田又出面到各油坊走了一遍，名曰“安慰”，实则威逼。他说，他到省公署见了日本人的省次长，表示大家都
很支持成立大油坊，愿意支援“大东亚圣战”，只是各油坊都有苦衷，希望“大检举”不要再扩大了，云云。大家心里更清楚了，这次大检举就是为了威逼向“龙兴制油株式会社”就范，而这又是与“大东亚圣战”联系着的，这就非同小可了。

过了几天，杨景溥放出来了，大家都很高兴。油坊交出去已成定局，只要人平安就行啊！杨景溥也为自己平安出来庆幸，吩

咐给后院的“胡三太爷”烧香摆供，我们都磕了头，认为万事大吉了。没曾想，当天下午，经济保安科又来电话，叫下午去人，掌柜的都吓得溜走了，只得我去。到了那里，过堂的是个叫坂田的日本人，问我们私卖了多少豆油，什么人去私打油。我说各机关都来打过油，并一一列举了这些机关。坂田又问，你们知道豆油是统制品吗？知道为什么还给？我说不给不行，他们找别扭。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报告，我说不敢，报告了乱子就更大。坂田一听就火了，把我拖到后院的刑讯室，先拿一根一头粗一头细、五尺来长的棒子打我，接着又拿鞭子抽。估计打了两个小时，将我放回。我回到柜上一看，两腿外侧，从大腿根到膝盖都黑成一片，脖子和手背也是黑紫色，腿肿了，无法走路。杨景溥找来了孟大夫给我治疗。正在这时，柜上管院子的掌柜庞玉文也一瘸一拐地从警务处回来了，他也挨了打，屁股打青了，看上去比我轻点。杨副经理让孟大夫给他和我一起治，他说，我不治了，我伤轻，我得走，今天晚车我就走，否则再押起来过堂就回不去老家了（老家在关里昌黎）。杨经理一听就慌了，赶忙说，你可不能走，否则说我们私弊大，把知情人放跑，就有口难辩了。但是怎么劝说也不行，当晚，庞玉文就上开原他兄弟处避风去了。不几天，柜上有个叫孙子阳的朋友，他和“万字会”很熟，因为我们东家史烛尘也在“万字会”，因此孙子阳经常手拿串珠，满口佛经地来串门。今天他来，三言两语就扯到了“万字会”老佛爷的神通，保福避灾，十分灵验，此时的杨经理正彷徨犹豫，六神无主，很快就被孙子阳说活了心，又赶上乱坛正在齐市，亲自去看了，十分相信，就申请加入。“老佛爷”给起了“佛名”，并给了一个椭圆形的牌子带在衣襟前，从此便可逢凶化吉了。随后孙又

来说，老佛爷如此施恩，应有所表示，杨经理当即叫帐房送去五百元钱。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孙这样的人是“万字会”的掳客，专门乘人之危，拉人入会，从中谋利，并以此为生的。

被经济保安科抓去的人都陆续放出来了。有挨打的，只不过是在过堂时挨伪警察几个嘴巴而已，遭成顿毒打的就是我一个。以后有人告诉我，杨经理一放出来，就应立即往坂田家送礼，礼未送到，所以才挨了一顿毒打，这叫什么世道！

一天，我正住在柜上养伤，忽然市公署劳动科来电话要劳工数，因接电话的人年青未答对好，电话耳机又撂重了，对方就说是摔打他们。当天下午，劳动科长（日本人）带了几个日伪人员来闹事，说这是瞧不起劳动科，是“反满抗日”。我急忙从后屋一瘸一拐地来到前柜房，满脸堆笑地百般赔礼，才把他们支走。晚上，我又带着伤找到劳动科长家进行赔礼解释。最后送了六百元钱给他才算罢休。那年头，每天提心吊胆，不知灾祸何时会降临。

杨经理自加入“万字会”后，自持有“老佛爷”保佑，平安无事，精神上轻松了些。但是，没曾想，“老佛爷”也挡不住日寇。那天，我未在柜上，日本宪兵队来了一个叫木户的“宪补”。他本意是想打油，把名片递给杨景溥。杨年老眼花，正好眼镜又未带在身边，看字分不出倒正，就将名片倒拿着端详。这下子可坏了，木户立即翻脸，说是污辱了他，让杨下午四点钟到宪兵队去，说完转身走了。等我们回来，都犯了愁，到宪兵队去还有好吗？怎么办呢？去主动赔礼，找不到木户，让老头子去挨打，又于心不忍。大家冥思苦想也想不出法子。后来鲁德美出了个主意，他说把义增永的王麟书经理找来，王与木户有旧交，让

他说说话。于是将王经理请来。下午四点，杨景溥故意未去。四点多一点，木户来了电话，口气很横，“杨为什么不来？快来！”王经理急忙接过电话说：您是木户先生吗！我是义增永的王麟书呵！我来德增盛串门，听说杨经理得罪了您，他很害怕，大大的害怕。他人老眼花，看不清楚，把您的名片拿倒了，这是大大的不对。看我的面子原谅他这一回吧！杨是我的大大的朋友，不要叫他去宪兵队了。木户懂中国话，听王经理这么一说，也就消了点火，王经理又说了不少好话，对方才算答应了。这时，满屋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了下来。

不久听说，警务处将“大检举”这场案子，过到伪检察厅去了。各油坊具保随叫随到，当年十月，又转到伪法院，传讯了两三次，才将此案结束。昌记油坊经理李晓生，被夏大个子毒打，毒火归心而亡。德增盛被罚款四千元，其他各家也都有数额不同的罚款。

从一九四二年四月到十月这半年的时间日子真不好过，一面打经济官司，一面是“三菱”逼债，挤兑向大油坊入股。经这么一折腾，各家早已倾家荡产，再无油水可挤了；特别是通过这次“大检举”，大家都已筋疲力尽、唯命是听了。硬的过去了，“三菱”又要出软的一手，发起了“善心”，想出一个“暖帘代”的名词，意思是说各油坊都是老户，守信用，这次向“龙兴制油株式会社”投资，有助于提高“龙兴”的信誉，应当在油榨作价上优厚，加价一倍，每台油榨由五百元变成了一千元。各油坊就都将欠债还上了，有的还有剩头。就这样，“龙兴制油株式会社”正式建立起来，设在齐市铁道东日满制粉所（现在的齐市面粉厂）西侧，社长王玉堂，发行了股票。各油坊按机器核价领取了股

票，又将股票偿还了“三菱”的债务。机器作价后，伪税务局和税务监督署又来“敲竹杠”，说是机器在“龙兴”作价高了，赚了钱，又要交所得税。“龙兴制油株式会社”是一九四二年春开始土木施工的，到冬天，便开始拆各家机器往大油坊拉，“三菱”入的股是三十六台水压机，及××元现金。一九四三年冬，大油坊部分建成投产，日本人把持一切，专横跋扈，德增盛的程悦庭、义增永的王麟书在大油坊给挂了个科长的头衔，说了不算，无非是每月领薪水而已。各油坊入股后，人员和机器都并入大油坊。总算还不错，有个职业，没有被抓去当劳工的危险。

我当时未上大油坊，仍在德增盛旧摊子经营制米厂，任店员，工人总共还剩三十多人，一直维持到解放。

回忆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到，继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之后伴随着的就是经济侵略，其包围圈也是步步紧缩，直到把你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企业全部吞并为止。制油业是如此，其他行业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噩运。例如什么“自动车出租株式会社”、“饲料加工株式会社”、“牛奶株式会社”等等不胜枚举，都是将民族工商业吞并了。当时还有一个“人寿保险株式会社”，硬叫各家经理加入人寿保险，这叫向“大东亚圣战”献纳“赤诚”。日本帝国主义是敲骨吸髓般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汉奸则是与他们狼狈为奸，往人民的骨头节上插针。公私合营后，我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政治经济学，才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必然对外进行侵略，推行殖民主义政策，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本性。

回忆同记商场

刘实秋

编者按：同记商场是黑龙江省城乡闻名、规模较大的百货商场，自一九〇七年创建以来，经历了中华民国、伪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兴衰演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榨下，求生存求发展的真实写照，有力地证明了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的民族工商业才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原同记商场经理刘实秋同志，在同记商场服务五十多年，是历史的见证人。他撰写的这份《回忆同记商场》，比较全面和具体地记述了同记商场的历史沿革、经营特点和方法，以及各种规章制度，对我们吸取经验，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哈尔滨市民建和工商联，把征集撰写这部史料纳入今年两会工作计划，抽调专人协助刘实秋同志搜集资料、修改文稿；两会领导同志经常过问史料的撰写工作，并对撰写人给予热情的关怀和支持，从而使这一史料能够早日同广大读者见面。